

香港華人的身份認同：九七前後的轉變

◎ 鄭宏泰、黃紹倫

* 從1988年起，在大學研究資助局 (University Research Grants Council) 的資助下，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和香港理工大學攜手合作，每兩年一次進行全港性的社會指標調查，藉以了解香港社會的發展情況。本文有關資料，便取自歷屆 (1988-2001) 的調查結果，謹此致謝。
本文曾於2002年5月在台北和高雄舉行的研討會上發表，並獲與會者不少寶貴意見、批評和指正，在此也必須致以謝忱；參與研討會的經費，得到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香港文化與社會」研究計劃資助，亦一併致謝。

引言

長久以來，身份認同一直困擾著大部份的香港華人。每當遇上國家大事如「釣魚台事件」、八九天安門事件、北京申辦奧運等時刻，他們會認為自己是中國人。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 (a part of China)，自然是中國人；但在某些情況下，例如香港所推行的資本主義制度、民主人權等，他們又自覺和大陸有別 (apart from China)，自己是香港人¹。這種身份認同上的左搖右擺，心理和認知上的無稜兩可，恰好反映香港華人所處之地、所經歷的歷史，亦和他們能夠在高度競爭多變的商業世界下 (以西方文化為主導) 適應下來，並發揮其所長的特徵。

身份複雜

正如科大衛所言²，香港是中國的一個沿海城市，也是一個由華人組成的城市，一個大都會。除此之外，她也是一個殖民地。香港人在身份認同上的含糊不清，是根源於英國殖民統治。清政府一八四二年屈從於英國的船堅炮利，割地賠款，揭開了香港這籍籍無名小漁港的歷史。英政府管治東南亞殖民時都是盡量保留當地文化與傳統，對香港的政策亦不例外³。作為一個人口九成以上為華人的地方，中華文化大體上都受保障，從一夫多妻制，男人可以立妾的傳統，要到一九七二年才正式被廢止這一例子中，大略可了解英政府「文化不干預政策」的一鱗半爪。當然，仍有香港華人不滿受「異族」統治，以鮮血對抗港英政府的事件發生⁴，但大致上，港英政府的「懷柔」政策已大大消弭了華人的對抗心理。隨著經濟的發展、教育、傳媒和政府政策等的潛移默化，「殖民統治」的形象也日漸淡化⁵，香港華人在身份上已出現殖民地下的「順民」和「炎黃子孫」的雙重身份了。

香港華人身份的含糊與難民心態 (refugee mentality) 亦有重要關係。二十世紀的中國是個多災多難政治動盪的國家，滿清皇朝分崩離析，國家社會動亂不安，中華民國的成立、軍閥

割據、日本入侵均是一場又一場的災難洗禮。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仍不能為中國帶來和平、安樂。國、共內戰與國民黨敗走台灣，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終於結束了上半世紀以來的亂局。但大亂過後並未帶來大治，反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三反五反、大躍進、大饑荒、文化大革命等等，都是一場比一場嚴重的政治整肅運動，中國人民還要飽受社會動盪不安的煎熬。面對國家千瘡百孔，一窮二白，鄧小平提出經濟改革時說得很有神髓，也把握了實情：「不開放改革便有死路一條」。結果在世紀末中國大門終於敞開，中國人民也真正可以面向世界，初嘗災劫過後的和平和機遇。

在一浪浪的災難中，大量難民從大陸——尤以沿海及廣東一帶為甚——湧入香港。戰後香港人口約為五十萬，一九四七年跳至一百八十萬，其中單是一九四九至五零年一年內便有約776,000難民流入香港⁶，到了一九五三年，人口已升至二百五十萬。短短八年間，人口增加了二百萬。換言之，當時每五人中便有四人為該時期內的難民移民。按林潔珍與廖柏偉的統計⁷，在一九六一年，全港人口為3,168,100人，其中50.5%中國出生的，47.7%為香港出生的，和1.8%為其他地方出生，以此計算，當時有超過一半是移民人口（52.3%）。俟後，移民仍不斷湧入。直至一九八零年十月二十四日，港府實施「抵壘政策」（reached base policy），非法移民潮才受到控制⁸。由此可見，香港是一個由華人難民組成的殖民地城市。

移民初期，大部分人都沒有把香港當作在他們「落地生根」的地方，因此，在身份認同上，仍以中國人或祖籍/出生地為主。就連香港初期的人口普查，也只是以市民的「籍貫」，而非後來的「出生地」為主要分類。其後憑著個人吃苦耐勞、肯捱敢搏，香港華人開始享受到經濟發展的成果，與此同時，大陸的同胞卻活在貧窮當中，因此香港華人的難民心態漸減。明顯地，他們對香港「日久生情」，對「香港人」的身份亦由疏離，進而接受及產生認同，這感情發展是可以理解的。可是，由於難民心態仍有很大的影響力，這時期的香港人在接受新身份的同時，仍有以「中國人」自居的。

六、七十年代香港經濟起飛，土生土長的一群也同時冒起。與難民一代最明顯不同，新一代生長於斯，共同在學校接受教育，在政府提供的屋村球場上留下汗水，在家中收看著免費的電視娛樂，「這種共存（co-presence）和團體的感覺…確立了（香港人）自己的身份，並且在彼（中國人）此（香港人）之間劃上清晰的界線」⁹。毫無疑問，戰後在香港成長的一代，無論生活、工作、娛樂、消閒各方面都相近，對建立香港的自我身份認同有直接影響。而新生代對中國既無所知，亦無所感，加上負面的描述如電視劇中土裡土氣的「阿燦」、「表叔」，電影中兇狠殘暴的「旗兵」、「大圈」等角色定形，反而加強了他們對中國的抗拒。因此，在身份認同上，新一代較認同自己為「香港人」，而非「中國人」了¹⁰。

政治因素，也令香港華人身份更形複雜。在五、六十年代抵港難民當中，不乏親國民黨人士，他們不認同共產黨政權，然而又不能否定共產黨建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中國的事實，對他們而言，「中國人」的概念更加複雜¹¹。殖民地政府有系統地除去民族認同感（de-ethnicization）過程的「非中國化」政策，也減弱了香港華人對「中國人」身份的認同¹²。在香港，無論是教育、政府政策、宣傳等，均「淡化」中國因素，以減低大陸對香港華人的衝擊。

香港華人生活在殖民地資本主義制度下，亦嘗到這種制度的甜頭，對共產政權或多或少抱有畏懼或「敬而遠之」的心態¹³。就算對中華文化有認同，在理解自我身份時，仍在「中國人」、「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等概念上糾纏不清，正如前新華社駐香港社長許家屯

指出¹⁴，大部份香港人都覺得自己愛國，但他們所愛的國家和大陸所指的不同，他們愛的是「中華民族」。相對而言，「香港人」的身份認同則比較清晰直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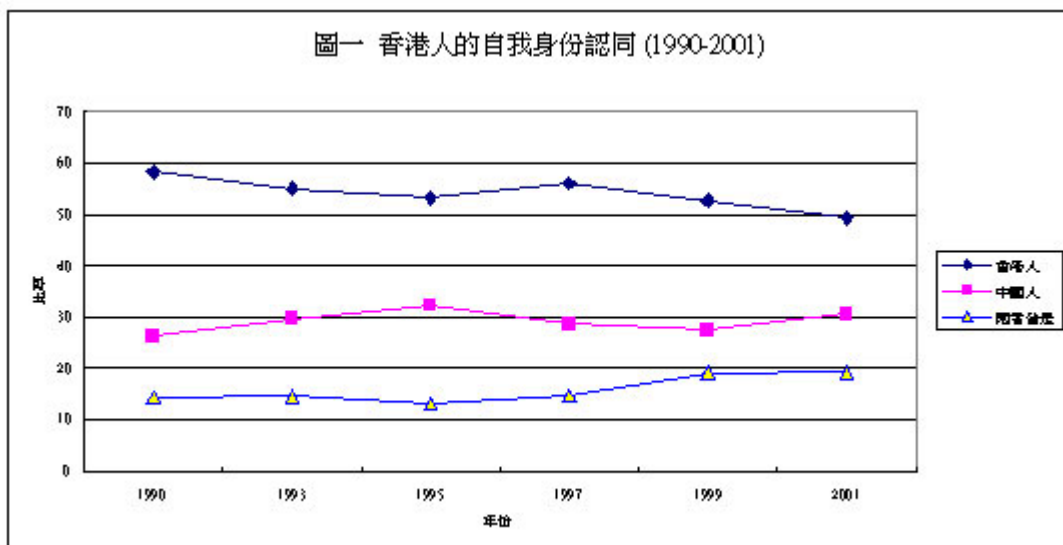
「中國人」「香港人」的定義

隨著九七年主權回歸與殖民地色彩的退卻，香港華人的身份認同理論上應該比較明確了，然而，實際上這問題仍困擾著不少香港華人。下文我們嘗試探討九七前後的「中國人」及「香港人」對香港的歸屬感、對前途的信心、對中國政府及香港政府的信任度，以及他們如何理解香港的政治、經濟和法律狀況，從中剖析身份認同上的差異及箇中因由。

在《「香港人」或「中國人」：香港華人的身份認同 1985-1995》一文中，劉兆佳指出：「香港華人普遍使用『香港人』及『中國人』兩個詞(語)來指謂自己…『香港人』及『中國人』乃是香港華人感到最有意義的兩種身份。」¹⁵。為了方便分析，本文採用劉氏將香港華人身份認同上較為簡單的分析介定方法，即是如果受訪者的自我身份認同為「香港人」，便簡稱「香港人」；認同自我身份為「中國人」的，則簡稱「中國人」，而認為自己身份既是「中國人」又是「香港人」的，則簡稱「兩者皆是」，反之認為自己既不是「中國人」又不是「香港人」的，為「兩者皆非」，他們可能有外國國籍，因而認為不是「中國人」或「香港人」。在此我們必須指出，本文所指的「香港人」或「中國人」概念，只是指受訪者本身的主觀感受而已，並非學術界的定義或內涵。另一方面，也希望可以籍著此文可以和劉氏的文章作出回應，補充回歸之後香港人身份認同上的一些轉變。

「中國人」和「香港人」的特徵

如前述，導致香港華人在身份認同上出現分歧和含糊，是難民心態和新一代成長歷程不同等因素交織而成的。調查資料的分析，恰好印證這一說法。(一)「香港人」身份漸有減少，「中國人」身份變化不大，九九年起則慢慢冒升。一九九零年的調查顯示，有近六成受訪者認為自己是「香港人」，認為自己是「中國人」的，約為二成半；到了二零零一年，認為自己是「香港人」的減至五成，認為自己是「中國人」的則增至三成(圖一)。



(二) 認為自己「兩者皆是」(既是「中國人」又是「香港人」)的比例也日趨上升。一九九零

年時，不足一成半受訪者認為自己「兩者都是」，到了二零零一年，比率已增至兩成（表一）。這趨勢反映受訪者對自己的身份出現遲疑不決，比較含糊的情況。其次，「兩者皆是」這種較為搖擺和騎牆的立場，可能是香港歷史的產物，是由殖民地走向回歸祖國的一種「身份過渡」。

（三）一九九七年香港主權的回歸，對香港人身份認同有很大的衝擊。香港回歸問題被提升為國際性事件，引來全世界的關注，國際媒體報導頻頻。中、英兩國也在回歸的日子，放下爭拗，為香港製造和平穩定、歌舞昇平的氣氛。大部份香港市民感有榮焉，對自己「香港人的身份」，也增添了一份自豪感，我們稱這種現象為「九七效應」。一九九七年的調查中，認為自己是「香港人」的比率明顯上升，便是這種效應的影響。下文我們嘗試從受訪者的出生地、年齡、教育水平和居港年份，深入剖析他們在身份認同上的變化。

表一 香港人的自我身份認同（1990-2001）（%）

年份	香港人	中國人	兩者皆是	兩者皆非	人數
2001	49.3	30.6	19.2	0.8	4049
1999	52.7	27.4	19.1	0.9	3227
1997	56.1	28.6	14.6	0.6	2078
1995	53.2	32.3	13.1	1.2	2226
1993	55.1	29.6	14.5	0.8	1942
1990	58.3	26.2	14.3	1.2	1900

首先，從被訪者的出生地中，我們發現「香港出生」的受訪者，有六至七成認為自己是「香港人」；認為自己是「中國人」的不足二成。從九零至二零零一年的趨勢上看，認為自己是「香港人」的（除一九九七年的特殊轉變時刻外），大體上正在減少，而認為自己是「中國人」的則在慢慢上升。香港以外地方出生的受訪者（主要是中國出生），則較多認為自己是「中國人」，認為自己是「香港人」的為數亦不少，但比率遠不如香港出生的受訪者般「壁壘分明」。但無論是「香港出生」或「外地出生」的受訪者，認為自己是「香港人」的比率亦在下降中：例如在一九九零年，有39.7%受訪者覺得自己是「香港人」，一九九二年略降至37.9%，九五、九七及九九年分別為37.4%、36.9%及36.6%。似乎香港華人正認為自己是「香港人」身份的比率，正日漸減少，而「中國人」的身份則日漸獲得認同（表二）。這一點，與王家英認為「香港人」的身份認同較強，而中國民族認同顯注弱化的研究，有一定程度的出入¹⁶。亦與梁伯華¹⁷認為「香港人」身份認同正在上升的結論相反。我們的研究資料支持劉兆佳的看法：香港華人身份認同上出現方向性轉變，而「香港人」的身份認同正在下降，「中國人」和「兩者皆是」者則在上升¹⁸。

不同的年齡組別，對身份認同亦有明顯的差異。三十歲以下的受訪者接近七成認為自己是「香港人」，而認為自己是「中國人」的則在成半至二成半間。同樣，這分野亦隨時間過去而有轉變的跡象。認為自己是「香港人」的30-54歲受訪者比率過半，認為自己是「中國人」從未超過三成。相對於較年輕的受訪者，五十四歲以上的一群在認同上出現灰色地帶，認為自己是「中國人」和「香港人」的比率十分接近，一直在三成半至四成間爭逐，互有高低（表二）。這情況或反映了這組別受訪者心中的矛盾：一方面對大陸（或家鄉）存有濃厚感情，

但同時對香港這地方亦漸產生強烈的歸屬感。

表二 從出生地、年齡及教育程度看香港人的自我身份認同(%)

	香港人	中國人	兩者皆是	兩者皆不是	人數	卡方
出生地						
2001						
香港	61.8	19.8	17.8	0.7	2327	x=388.805
其他地方	32.6	45.3	21.1	1	1720	df=3
1999						
香港	63.5	18.3	17.7	0.5	1933	x=263.201
其他地方	36.6	40.9	21.1	1.5	1291	Df=3
1997						
香港	70.4	17.2	12.2	0.2	1193	x=249.023
其他地方	36.9	43.9	17.9	1.2	883	Df=3
1995						
香港	65.8	20.6	12.9	0.6	1260	x=210.533
其他地方	37.4	47.4	13.4	1.9	963	Df=3
1993						
香港	67.9	18.2	13.4	0.5	1120	x=201.503
其他地方	37.9	45.2	15.8	1.1	818	df=6
1990						
香港	70.5	16.9	12.4	0.3	1151	x=200.037
其他地方	39.7	40.6	17.1	2.7	749	df=3
P=0.000						
年齡						
2001						
<30	58.2	23.4	17.5	0.9	662	x=123.522
30-54	52.4	27.9	18.9	0.8	2458	df=6
>54	34.7	43.5	21.1	0.8	906	P=0.000
1999						
<30	57.7	20.4	21.4	0.5	603	X=73.787
30-54	55.4	25.7	17.9	1.1	1962	df=6
>54	40.2	38.8	20.2	0.8	647	p=0.000
1997						
<30	66.2	19.7	13.1	1	411	X=55.825
30-54	57.4	28.4	13.7	0.6	1265	df=6
>54	41.7	38.4	19.4	0.5	396	p=0.000
1995						
<30	60	24.6	14.7	0.7	448	X=62.902
30-54	56.2	29.9	12.6	1.4	1333	df=6
>54	39.2	46.6	13.1	1.1	436	p=0.000
1993						
<30	61.1	23.3	14.6	0.9	437	X=54.253
30-54	57.9	27.4	13.9	0.8	1129	df=6
>54	39.8	43.9	15.7	0.5	369	p=0.000
1990						
<30	67.8	16.8	14.8	0.6	636	X=95.884
30-54	58.1	26.7	13.3	1.9	961	df=6
>54	39.3	44.3	16	0.3	300	p=0.000

教育程度

2001

低	41.3	37	20.6	1.2	1204	X=59.519
中	52.5	29.1	17.9	0.6	2167	df=6
高	53.8	24.2	21	1.1	666	p=0.000

1999

低	46.7	31.1	21.3	0.8	948	X=39.681
中	56.8	25.9	16.7	0.6	1756	df=6
高	49.9	25.3	22.8	1.9	517	p=0.000

1997

低	45.3	39.8	14.3	0.6	643	X=64.847
中	61.1	24.3	13.8	0.7	1127	df=6
高	60.4	21.1	18.2	0.3	308	p=0.000

1995

低	46	39.8	13.3	1	732	X=39.903
中	57.6	28.1	13.3	0.9	1201	df=6
高	56.5	28.8	11.9	2.8	285	p=0.000

1993

低	45.8	39	15.2	0	670	X=56.684
中	59.7	25.4	13.7	1.2	1028	df=6
高	61.5	21.3	15.9	1.3	239	p=0.000

1990

低	49.6	34.2	14.7	1.5	593	X=35.995
中	62.5	23.4	13.1	1.1	949	df=6
高	63.7	20	15.1	1.2	325	p=0.000

為了印證「本地生」和「外地生」受訪者在身份認同上的差異，我們將「外地生」受訪者居港年期再細分，並比較他們在身份認同上的轉變。根據香港《人民入境條例》中的《居留權法》，外地合法移民連續在港居住七年以上，才可擁有香港永久居留權這一規定為分水嶺，我們將受訪者細分為四組：居港七年以下、七年至十五年、十六年至二十五年及二十五年以上。首先，資料顯示他們對香港歸屬感有明顯的轉變。隨著居港年份增加，他們對香港的歸屬感亦相對增強，這現象在歷屆調查結果都十分一致。比較突出的是，居港七年以下受訪者表示對香港的歸屬感是「少」或「很少」的，較其他三組顯注(表三)。這種情況，或者正是他們的身份未獲確定的直接反投射。其次在身份認同上，絕大部分居港七年以下者，都認同自己是「中國人」，而認為自己是「香港人」或「兩者皆是」的則比較接近。隨著居港年份增加，他們認為自己是「香港人」的比率亦漸增，認同自己是「中國人」則漸減。而當他們居港超過二十五年，「中國人」和「香港人」的認同基本數量已相當接近，表示「外地生」的受訪者已融入香港社會。

表三 從居港年份(非香港出生)看香港人的自我身份認同(%)

居港年份	香港人	中國人	兩者皆是	兩者皆不是	人數	卡方
2001						
1至6	19	55.4	22.3	3.2	121	X=33.003
7至15	24.1	51.9	22.6	1.4	212	df=9
16至25	31.8	45.8	21.8	0.6	478	p=0.000
25以上	37.2	42.1	19.9	0.8	884	
1999						
1至6	18.6	52.3	27.9	1.2	86	X=24.525

7至15	30.5	47.7	19.2	2.6	151	df=9
16至25	35.5	42.9	20.8	0.8	366	p=0.004
25以上	40.7	37	20.7	1.5	675	
1997						
1至6	28.1	49.1	19.3	3.5	57	X=24.873
7至15	23.1	52.5	22.4	2.2	134	df=9
16至25	35.8	43.2	19.6	1.5	271	p=0.003
25以上	43.2	41	15.3	0.5	417	
1995						
1至6	15.6	67.2	14.1	3.1	64	X=29.500
7至15	31.4	49.5	16.5	2.7	188	df=9
16至25	36.1	48.8	12.7	2.4	205	p=0.001
25以上	44.4	42.3	12.2	1	482	
1993						
1至6	17	60.4	22.6	0	53	x=37.314
7至15	26.7	54.5	16.8	2	202	df=9
16至25	47.3	36.6	13.4	2.7	112	p=0.000
25以上	42.3	41.9	15.6	0.2	430	
1990						
1至6	22.7	54.5	20.5	2.3	44	x=26.761
7至15	34.3	44.4	15.2	6.2	178	df=9
16至25	53.2	28.4	15.6	2.8	109	p=0.002
25以上	40.3	40.6	17.7	1.4	36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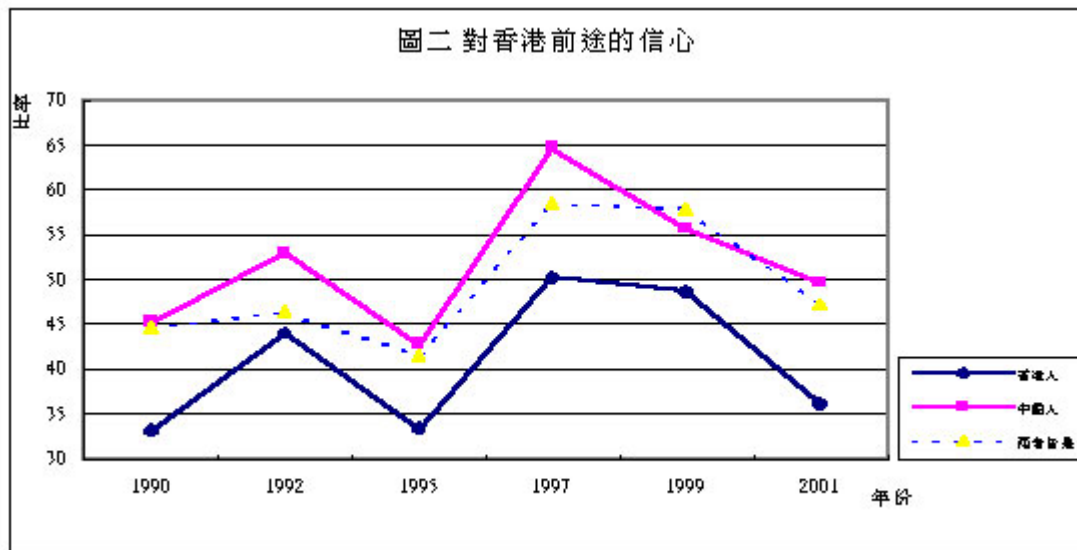
受訪者的教育程度亦影響到香港華人對自我身份的看法。整體上，教育程度越高，越傾向認為自己是「香港人」，調查發現有五成至六成高學歷受訪者持有這種看法；而認為自己是「中國人」的則佔二至三成左右。低學歷受訪者取向並不明顯，認為自己是「中國人」和「香港人」的比率很接近。出現年齡和教育程度上有不同的身份認同，可以理解為難民心態與本地成長一代的相互影響。上一代來港的移民，大都為年長者，他們的教育水平也較低，而年青人則多為本地出生，教育水平比較高。因此，教育程度的高低，間接地反映出移民一代和本土一代心態上的差異。

從整體數據上分析，雖然「香港人」的比率正在減少，而「中國人」則在上升，我們仍不能因此簡單地推論「香港人」身份最終會給「中國人」身份所掩蓋。就算在二零零一年為例，「香港人」身份認同最低的時候，也有接近五成屬「香港人」與「中國人」（三成）之間，仍有相當大的差距。就算回歸四年後，香港經濟陷於困境，中國則「捷報頻頻」，國勢日強，認為自己是香港人身份的比率，仍佔主導。其次，正如前述，受訪者居港年份愈長，對香港的歸屬感和身份認同便愈大，很多「新來港移民」的身份認同，在香港本土文化的熏陶下，最終也會有所改變。因此，在現階段作出結論，認定「香港人」身份，將會給「中國人」身份所取代，是言之過早的。下文將嘗試從香港政經狀況的滿意度、對香港前途的信心、對移民的決擇和對中、港政府的信任四方面剖析「香港人」和「中國人」的不同看法及態度。

對香港前途的信心

從調查資料中，我們不難發現無論是「香港人」或「中國人」，他們對香港前途的信心皆是有升有跌的。九七回歸年，對前途的信心是最高的，有50.2%的「香港人」和64.36%的「中國

人」表示對香港前途有「大」或「很大」的信心。九七後則開始下降。整體上，「中國人」較「香港人」對香港前途更有信心，當中相差約有12%，在一九九七年及二零零一年的差距更大（圖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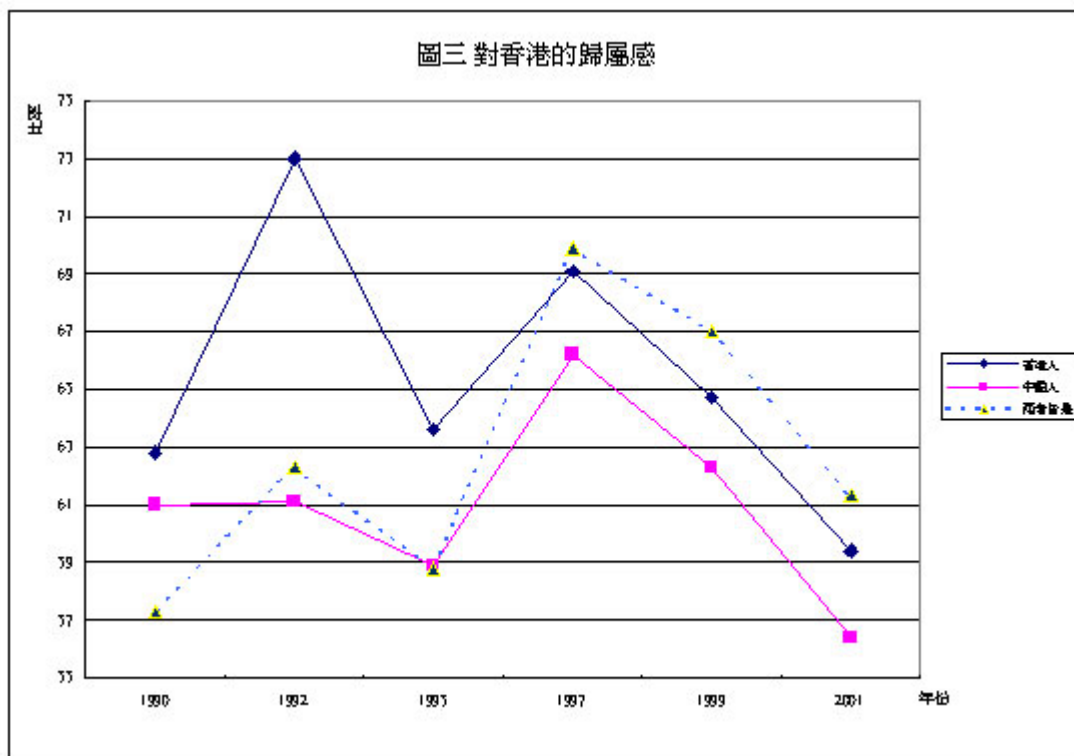


為什麼身為「香港人」反而對香港前途抱持較悲觀的看法呢？這是一個相當耐人尋味的問題。較為合理的解釋或許是因為香港政治前途不確定。從一九九七至二零零一年的調查結果顯示，「香港人」較「中國人」對一國兩制中的「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政策落實有較大的信心。該年，有51.6%的「中國人」「同意」或「很同意」中國政府已落實「港人治港」政策，而「香港人」則只有33.3%相信。到二零零一年，「同意」或「很同意」「港人治港」政策已充分落實的「中國人」有56.7%，而「香港人」則只有36.2%。彼此之間對政策能否成功推行，有近二成的差距，可見大家對香港前途和信心的分歧是不少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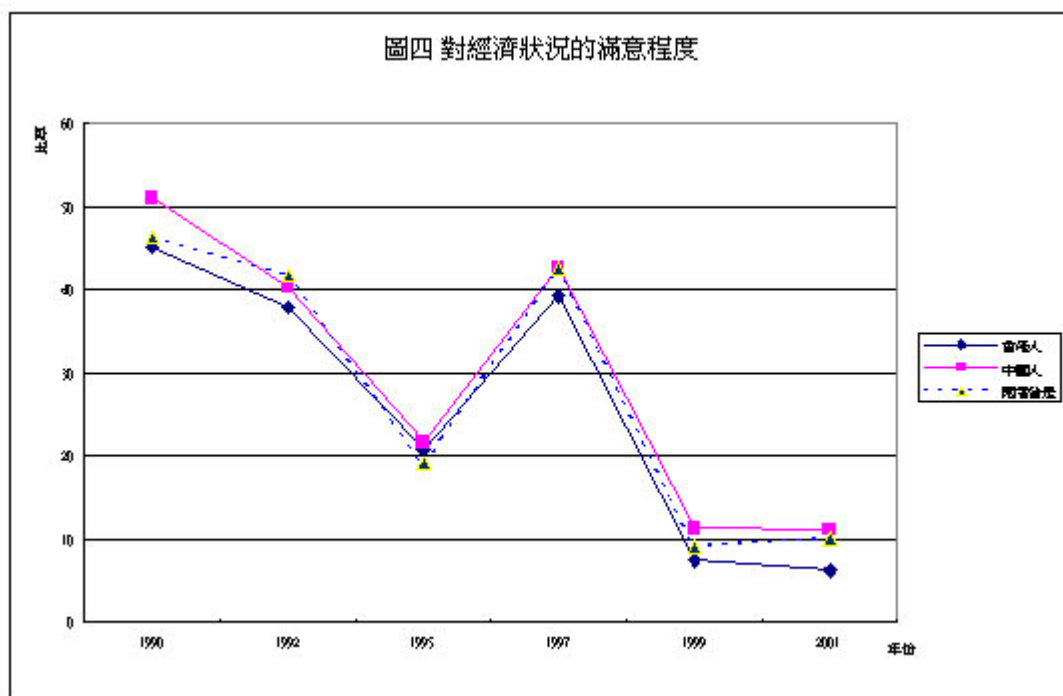
另一個測試「香港人」與「中國人」在前途信心上的異同，是有關他們對香港的歸屬感。整體上，「香港人」較「中國人」對香港有更大的歸屬感。這情況應該是理所當然的吧。「香港人」對香港的歸屬感在一九九三年的調查中，表現尤其強烈，超出「中國人」近11.9%，這是否因九一年立法局推行直選，或基於其他因素，調查資料未能顯示。到了一九九五年，差異略為收窄，九七年因回歸因素的刺激下又再度上升。但近年隨著香港經濟表現疲弱，九九及零一年調查結果都顯示「香港人」和「中國人」對香港的歸屬感均在下降（圖三）。

對政經狀況的滿意度

受訪者對香港政治、經濟和司法看法有異有同，在經濟上的看法，較為相似，但在政治和司法上，則出現分歧。經濟方面，無論是「香港人」或「中國人」，都對香港的經濟表現出強烈不滿，而且每下愈況。一九九零年時，無論是「中國人」還是「香港人」，他們對當時經濟狀況表示「滿意」和「很滿意」的，有四成半至五成多，九二年及九五年滿意度均在下跌，九七年一度大幅上升，可是到了一九九九年和二零零一年，比率再度下降至半成至一成左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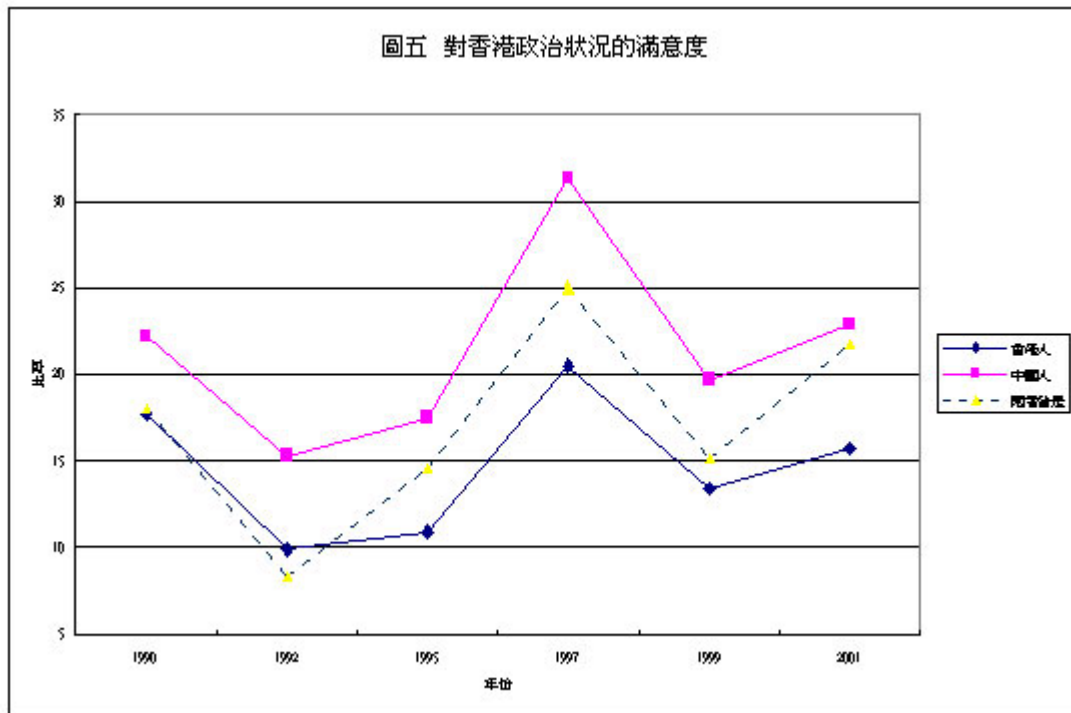


這情況一方面反映了香港經濟，在回歸後的急劇惡化和受訪者對政府經濟政策的不滿。亞洲金融風暴是其中一個因素，但政府政策的失誤，如干預自由市場運作、房屋政策的搖擺不定、不能迅速處理通縮及失業問題等，更加深了市民的不滿¹⁹。另一方面，也間接反映了無論是「中國人」或「香港人」，他們的經濟價值觀比較接近(圖四)。香港向來被視作是經濟、商業都會，很多難民來港，主要目的，也是為了尋求更好的物質生活，因此，香港市民往往被外界扣以「經濟動物」的帽子。調查數據或隱或現地帶出了「香港人」和「中國人」共有的經濟觀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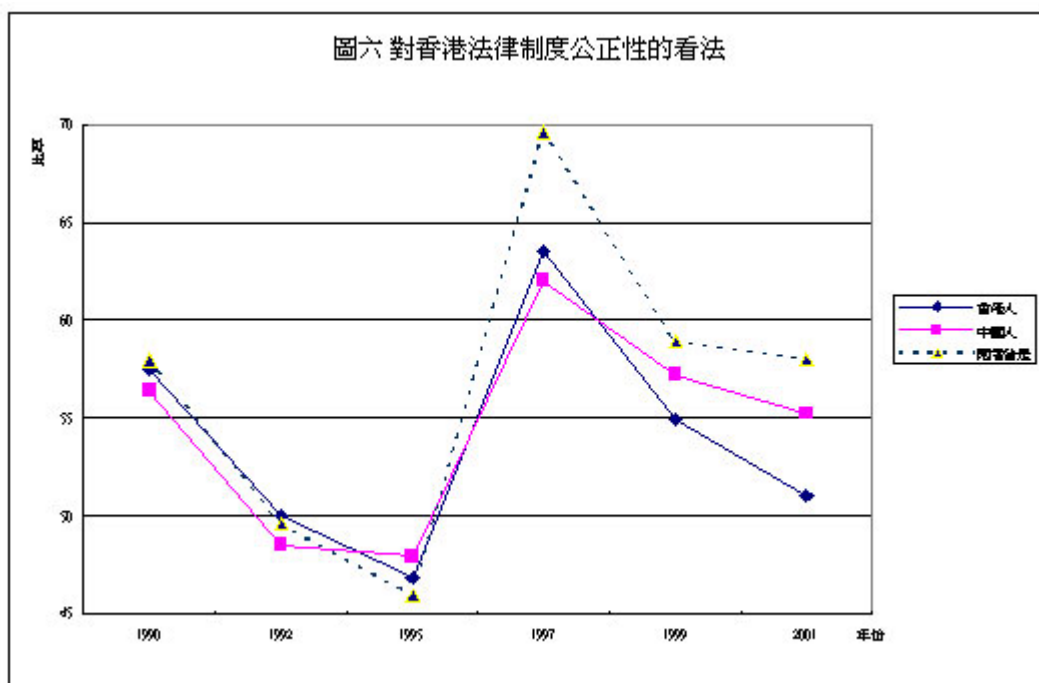


受訪者在經濟上較為一致的看法，並沒有在政治和司法上出現。在政治方面，「中國人」對香港的政治狀況較「香港人」滿意。從歷屆的調查資料上可以看到，「中國人」對香港的政治狀況較「香港人」高約有半成至一成多，其中又以一九九七年時的差距最大。另外，九七

過後，受訪者對香港政治的滿意度，有日漸上升的勢頭，這種情況，或者是香港政治制度較為開放，政府的透明度也漸有增加所致的（圖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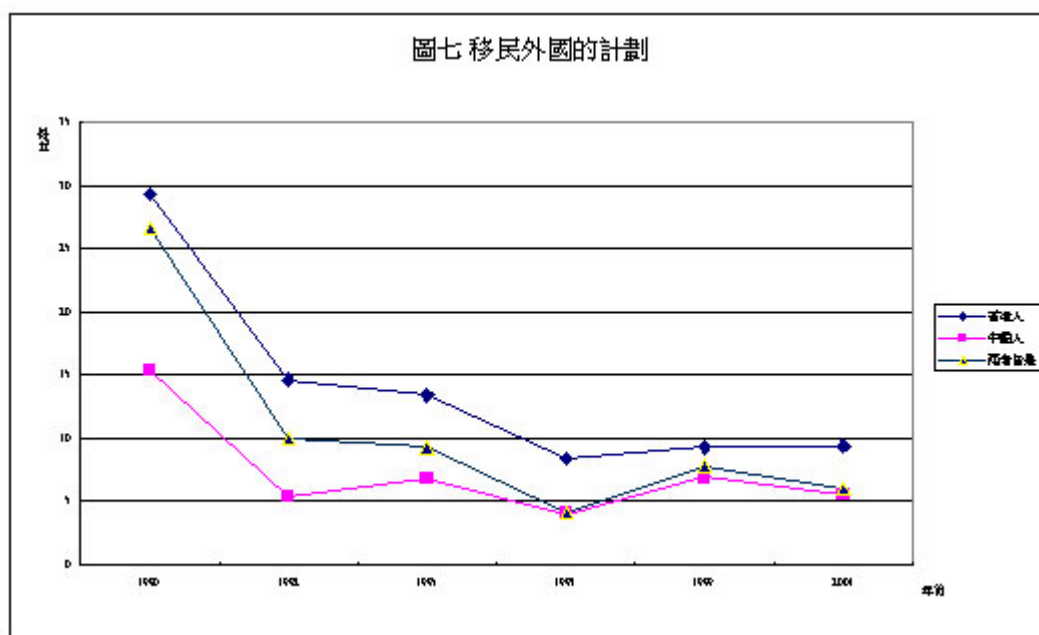
另外，「中國人」和「香港人」對香港司法制度是否公平、公正，亦各懷其見。一九九七年或前期，「香港人」較「中國人」同意港司法制度是「公正」、「很公正」的，但比率相差不大，例如在一九九零年，各有57.5%和56.4%的「香港人」和「中國人」同意此看法。但在九七年後，「香港人」對法制的公正性遠較「中國人」悲觀，差距更有擴大的趨勢，例如九七年時，「香港人」較「中國人」滿意香港的法律公正性；在九九年，此看法已有轉變。到了二零零一年，「香港人」對法律是否公正的信心已大幅下降，55.2%的「中國人」仍認為香港法律公平公正，而抱同樣看法的「香港人」已由高峰時的63.5%（九七年）降至51.0%（圖六）。這種情況，正是特區政府一些被受爭議的司法方針，例如不起訴胡仙、人大釋法和律政署選擇性地起訴個別案件，例如不起訴大法官阮雲道之子等事件，所引致的。



對香港政府歷年來的工作表現，「香港人」和「中國人」的看法，也有出入的地方。從資料顯示，有三點尤為突出：（一）整體而言，「中國人」較「香港人」讚同政府的表現，這情況九七前後分別不大。（二）無論是「中國人」還是「香港人」對政府的工作表現評分越來越差，九零年分別有二成和三成受訪者認為政府工作表現「好」或「很好」，但到了二零零一年，均跌至只有一成左右。（三）「九七效應」相當突出。受訪者對九七年的政府表現，評價甚高，分別有三成和三成半的「香港人」和「中國人」認為政府表現「好」或「很好」。可惜，九七回歸後，大家對政府的評價又再回落，甚至較回歸前的殖民地政府更差。

移民外國的抉擇

移民是一個複雜而影響長遠的決定。無論是「香港人」或「中國人」，歷年資料顯示有意計劃移民外國的比率正在下降。在一九九零年，有29.3%的「香港人」計劃移民外國，而「中國人」則只有約15.4%，這麼高的比率，應該是一九八九年北京天安門民主運動被鎮壓的影響。一九八四的《中英聯合聲明》已令香港華人感受到前途的不明朗，部分有能力移民外國的人士已選擇用行動表達他們對前途的不信任和恐懼。「六四事件」更激發香港華人的憂慮，移民外國、爭取外國居留權、「購買政治保險」便成為部分香港華人的重要目標，這正是一度引起社會關注的「人才外流」問題²⁰。其後比率不斷下跌，九七年跌至低位，到了二零零一年，有意移民的「香港人」只有9.4%，而「中國人」則為5.5%（圖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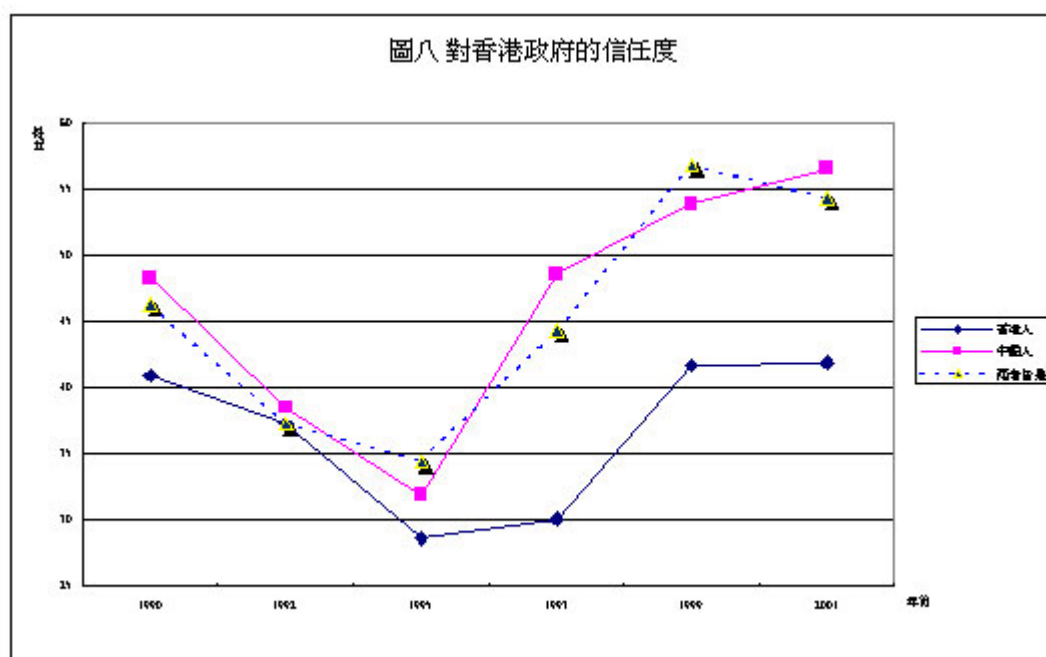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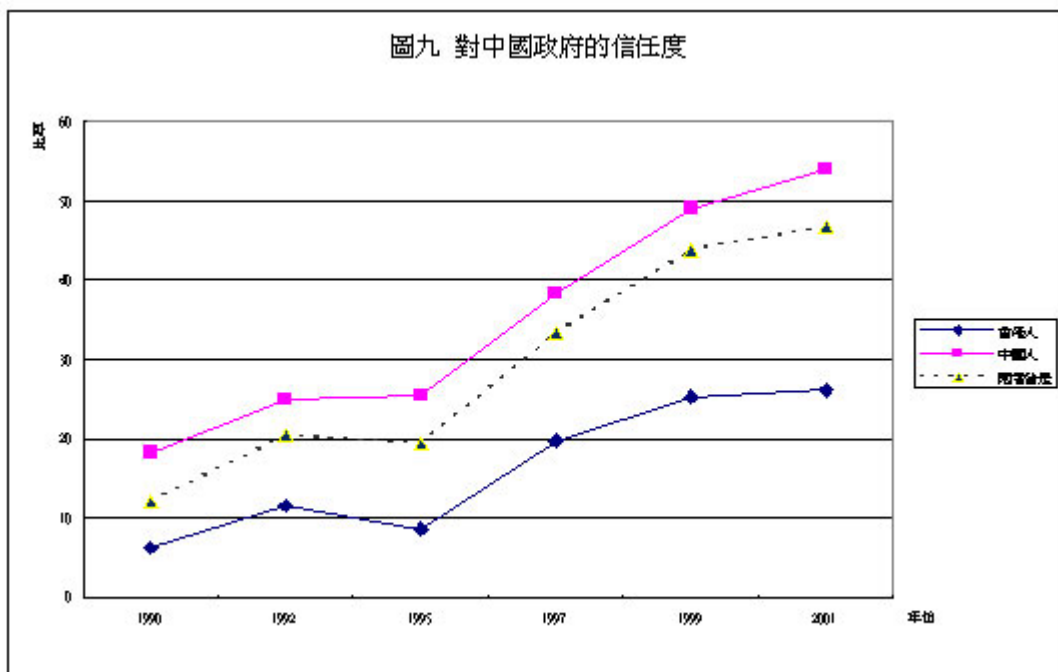
從有意移民外國的比率上看，「香港人」較「中國人」為高，這與「香港人」對香港有較高歸屬感的結果相反²¹。雖然打算移民離開香港的比率正在下降，但受訪者中擁有「外國居留權」的比率則在不停攀升，例如一九九零年，大約有4.2%和4.7%的「香港人」及「中國人」擁有外國居留權，一九九七年分別升至7.9%和5.9%，到了二零零一年，比率再上升至8.7%和6.9%。同樣，「香港人」較「中國人」擁有外國居留權的比例為高。這種表面上看來很矛盾的數據，其實正好反映出有受訪者取得外國居留權後，回流香港生活及工作的情況正在增加。奇怪的是，「九七效應」並沒有對受訪者移民計劃有顯著的影響。或者我們可以這樣理解，若香港華人會因九七回歸問題而決定移民，相信他們一早已作出安排，到九七年時，「消息已被消化」了，事實上亦來不及了，因此效應不彰。

對中港政府的信任度

「香港人」和「中國人」在身份認同上的差異，更明顯地反映在他們對中國政府和香港政府的信任態度上。九七年前，無論是「香港人」還是「中國人」，他們對香港政府的信任都在減退當中。九七年特區政府的信任度大幅提升，這種變化，應該是「非殖民地化」後，香港華人對回歸祖國懷抱比較正面的反應。「九七效應」明顯地對香港華人有一定的衝突。在九七年的調查中，有48.6%的「中國人」對香港政府「很信任」或「信任」；只有30.1%的「香港人」有這看法，在一九九九至二零零一年，受訪者對香港信任度仍在上升。「香港人」和「中國人」對香港政府信任度的比率相差正在擴大(圖八)。這種看法上的分歧，不應單純地理解為受訪者對「一國兩制，港人治港」政策的高度落實的看法，恰恰相反，我們應該注意到「香港人」對香港政府信任度「審慎」態度背後的擔憂。對「香港人」而言，政府是否能堅持「一國兩制」政策，不受大陸干預，仍有待觀察。因此他們對香港政府的信任度，增加的速度和幅度，沒有「中國人」那麼快速。

被訪者對政府的信任度雖然有落有起，但對中國政府的信任則「低位持續上升」。一九九零年，受訪者對中國政府的信任度十分低，6.3%的「香港人」表示「信任」或「很信任」，而「中國人」亦只有18.2%表示相似意見，這麼低的信任度，是八九年「六四事件」後的直接影響。對於香港華人而言，「六四事件」再次引發他們對中共政權的不信任和對前途的憂慮。俟後，受訪者對中國政府的信任度逐步提升。其中九五年因為彭定康的「全面直選」事件，引來中、英政治爭拗，香港華人對中國政府的信任度也因而下降。不過九五年過後，信任度再上升。到二零零一年，有54%的「中國人」信任中國政府，而「香港人」則有26.1%。與看待香港政府一樣，「香港人」和「中國人」對國政府信任度的差異也有擴大的跡象(圖九)。一九九零年，彼此對中國政府的信任，差別只有約一成(12%)，到了二零零一年，比率擴大至接近三成(28%)，這樣大的差距，相信正是彼此身份認同上迥異的關鍵所在了。





調查發現與評論

在本文開首之時，為了方便討論，只簡單地將「中國人」和「香港人」作出界定，但它們真實的意義和內涵，例如香港人的特質是甚麼？何謂「香港夢」？是高度敏感的經濟觸角，還是可以在不同環境下，也可以適應的能力？這些較深入的問題，我們並沒有觸及。其實，對這兩種身份的理解，向來都各有不同。就以「中國人」的身份理解為例，便各有各說，各持己見。生活在內地人的看法，和香港市民的看法便有不同；而香港市民與台灣人的理解又有差異；至於散居世界各地的華人，看法不同更加不用說了。

另一方面，我們同時注意到，無論是「中國人」或「香港人」，他們都不能避免地受到日漸強烈的「環球化」概念所影響。香港作為一個國際都會，又曾受英國所統治，視野和身份上，已播下「國際性」的「種子」，在「環球化」的衝擊下，較易作出調適。至於中國內陸，自經濟改革以至二零零一年年底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等歷史性發展，必不可免地使「中國人」身份和文化，與西方其他文明發生碰撞和交流，這些發展，肯定會對「中國人」的身份認同，帶來劃時代的轉變²²。以上的論點，牽涉層面甚廣，也值得有興趣的學者深入研究。可惜，這些並不是本文的焦點所在，因此我們並未作出深入的討論。

身份認同本身是一個複雜的概念，它「絕不是社會成員被動地接受某個身份的過程，而是個體主動地尋找一己社會行為意義，從而建構自己的身份」²³。因此，香港華人的身份認同，代表的不單單是他們在中國歷史文化影響下的認同或情感，還有其他因素諸如政治上的爭逐、經濟的追求和生活方式的選擇等概念。香港華人開始出現身份認同上的差異與含糊自有其歷史發展的偶然性和必然性，正是因為其歷史條件的獨特，香港華人身份上的轉變才顯得趣味盎然。

從調查中，我們發現「九七效應」對香港華人身份認同發揮相當決定性的影響。無論是對香港的歸屬感，對政治經濟的狀況，政府工作和信任或是對未來的信心等各方面，均反映出九七年主權回歸的歷史性轉變，深深地牽動著香港華人的心靈。在九七年，「香港人」更加明顯地表現出對香港的歸屬感，對香港的政治狀況也有不錯的看法。相對而言，「中國人」則

較程度上支持中國政府和特區政府，對未來也寄予厚望，相信「明天會更好」。可以想像，在一九九七年，報章傳媒天天計算著回歸的時分秒，討論著駐軍、交接儀式、新政府運作等事宜，就算是普羅市民也談論著九七後的種種可能性，「香港的過去和未來」成為大家關注的中心。同時，中英雙方避開政治爭議，刻意營造「融洽、和平」的局面，經濟發展一片大好，香港瀰漫著樂觀的氣氛。香港華人很自然地受到感染。因此，對當時的局勢有「異常」的反應和看法，香港華人的身份認同也特別強，這種「九七效應」自是可以理解的。

然而九八年發生了亞洲金融風暴，香港經濟泡沫爆破，香港華人對香港經濟狀況產生憂慮，再加上世界經濟不景氣，香港出現高失業、高通縮等情況，政府政策又未能對症下藥，香港華人開始為生計、工作而擔憂，對前景和未來的信心，自會不停下降，歸屬感也跟著減低。往昔「香港人」身份所帶來的那點優越感，開始有所動搖，這或者也是自認自己為「香港人」的比率愈來愈少的深層因由吧。

與此同時，與香港一河之隔、一衣帶水的深圳，經濟發展欣欣向榮。而中國大陸近年來經濟發展迅速，從一九七九年實行改革開放後，經濟增長率便一直站在世界前列，短短十年間已發展成繼美國和日本後世界第三大國民生產總值最高的國家。在國際外交上亦取得重大進展，例如成功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及將會在二零零八年主辦奧運會等，在國際舞台的位置日重，與歐美國平起平坐，都牽動著香港華人的民族感情。雖然「六四事件」曾令香港人不安反感，但其後中國經濟穩定發展及外交的成功又令香港華人羨慕或自豪，身份認同上因而出現微妙的變化。九七回歸，中港兩地交流接觸日益頻密，香港華人對中國大陸的了解亦有增加了，抗拒、隔閡也慢慢減退。

以上各種因素，此消彼長或相互影響，導至香港華人身份認同上出現種種轉變。調查資料清楚顯示認同自己是「香港人」的人數，有日漸減少的趨勢，認為自己是「中國人」的比率則變化不大，而「兩者皆是」的，則逐步上升和強化。不過從三者比率上的差距看，認同自己是「香港人」的身份，仍然佔著絕大比數，而認同「中國人」的身份趨勢，有待觀察。至於「兩者皆是」的比率漸多的情況，就是十分明顯的了。出現這種現象，正好反映對於部份香港華人而言，他們對「中國人」身份，仍有一定的抗拒。相反，「兩者皆是」的身份較為含糊，但也較有「彈性」，因此較易為受訪者受落。最後，我們不禁會問：「香港人」的身份，最終會否被「中國人」或「兩者皆是」的身份所取代呢？從三者比率的巨大差距上看，在現階段而言，相信仍是言之尚早，具體的發展，還是有待進一步發展和觀察。

註釋

- 1 Gordon Mathews, "Heung-gongyahn: On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of Hong Kong Identity", *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 29, no. 3 (1997): 3-13.
- 2 David Faure, *Society,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7).
- 3: 6 G. B. Endacott, *Government and People in Hong Kong, 1841-1962*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64).
- 4 蕭國健：《香港的歷史與文物》（香港：明報出版社，1997）。
- 5 Ming-kwan Lee, "Hong Kong Identity—Past and Present", in *Hong Kong Economy and Society: Challenges in the New Era*, ed. Siu-lun Wong and Toyojiro Maruya (Hong Kong: The Centre of Asian Studies,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98), 153-75.

- 7 林潔珍、廖柏偉：《移民與香港經濟》（香港：商務印書館，1998）。
- 8 Hong Kong Immigration Department, *Hong Kong Immigration Department 40th Anniversary Report* (Hong Kong: Government Printer, 2001).
- 9 馬傑偉：《電視與文化認同》（香港：突破出版社，1996），頁28-30。
- 10 王宏志、李小良、陳清僑：《否想香港：歷史、文化、未來》（台北：麥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7）；吳俊雄：〈尋找香港本土意識〉，《明報月刊》，1998年3月號，頁23-27；蕭鳳霞：〈香港再造：文化認同與政治差異〉，載程美寶、趙雨樂編：《香港史研究論著選輯》（香港：香港公開大學出版社，1999）。
- 11 蔡榮芳：《香港人之香港史：1841-1945》（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1）。
- 12 Sai-wing Leung, "Social Construction of Hong Kong Identity: A Partial Account", in *Indicators of Social Development: Hong Kong 1997*, ed. Siu-kai Lau, Ming-kwan Lee, Po-san Wan and Siu-lun Wong (Hong Kong: 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99), 111-34.
- 13 Siu-kai Lau, *Society and Politics in Hong Kong*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82)；劉兆佳：〈「香港人」或「中國人」：香港華人的身份認同 1985-1995〉，《二十一世紀》（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1997年6月號，頁43-58。
- 14 許家屯：《許家屯香港回憶錄》（台北：聯經出版社，1993）。
- 15 同註13劉兆佳（1997），頁43。
- 16 王家英：《香港人的族群認同與民族認同：一個自由主義的解釋》，*Occasional Paper*, no. 50 (Hong Kong: 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96).
- 17 Edwin Pak-Wah Leung, "Transition from De-ethnicization to Re-ethnicization: The Re-emergence of Chinese Ethnic Identity and the Birth of a New Culture in Hong Kong Prior to 1997", in *Hong Kong in Transition* (Hong Kong: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Economic Research Institute, 1992), 594-603.
- 18 同註13劉兆佳（1997）。
- 19 Victor Zheng, Kwok-keung Law and Siu-lun Wong, "From a Free Economy to an Interventionist Society: The Crisis of Governance in Hong Kong", in *Indicators of Social Development: Hong Kong 1999*, ed. Siu-kai Lau, Ming-kwan Lee, Po-san Wan and Siu-lun Wong (Hong Kong: 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01), 1-32.
- 20 Ronald Skeldon, "Emigration, Immigration and Fertility Decline: Demographic Integration or Disintegration", in *The Other Hong Kong Report: 1991*, ed. Yun-wing Sung and Ming-kwan Lee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91), 233-58.
- 21 Siu-lun Wong, "Political Attitudes and Identity", in *Emigration from Hong Kong: Tendencies and Impacts*, ed. Ronald Skeldon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95), 172；同註13劉兆佳（1997）。
- 22 參考「新世紀中國文化與全球化」專題，《明報月刊》，2002年5月號，頁19-31。內有劉再復、李澤厚、何兆武等的文章，對全球化的定位和衝擊有所分析。
- 23 梁世榮：〈香港人的身份認同：理論與研究方法的反思〉，載劉兆佳等編：《華人社會的變貌：社會指標的分析》（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8），頁190。

鄭宏泰 香港大學社會學系博士候選人，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研究助理。

黃紹倫 牛津大學社會學博士，現任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主任。